

## 中共中央关于苏联参战后 准备进占城市及交通要道的指示<sup>①</sup>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

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并转各区党委：

苏联参战后，日本政府有继续抵抗可能，亦有投降可能。在此伟大历史突变之时，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及各区党委，应立即布置动员一切力量，向敌、伪进行广泛的进攻，迅速扩大解放区，壮大我军，并须准备于日本投降时，我们能迅速占领所有被我包围和力所能及的大小城市、交通要道，以正规部队占领大城及要道，以游击队民兵占小城。在日本投降实现时，我军对日军应令其在一定时间内实行投降缴械，缴械后可予以优待，否则应以各种方法迫其投降缴械。对伪军，则应令其立即反正，接受我之委任与改编，并指令防区驻扎，否则应即消灭之。如遇顽军妨碍我们进占城镇和要道时，应以各种方法阻止以至打击消灭之。当我军进占城镇时，应宣布纲领，特别严明纪律，迅速建立革命秩序，加紧防卫，并注意爱护各种资材，照顾统一战线。在所有占领区，迅速发动群众并武装他们，主要是武装工人苦力。

中 央

(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① 本文原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8—1949）（13），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7年3月第1版。

## 中共晋察冀中央局通知（第一号）

（一九四五年九月十日）

根据中央决定，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改为中共晋察冀中央局，以聂荣臻、程子华、刘澜涛、赵振声、萧克、罗瑞卿、刘仁、许建国、胡锡奎、朱良才、成仿吾、赵尔陆、李运昌、詹才芳十四同志为委员，并指定聂程刘赵萧罗六同志为常委，聂荣臻为书记兼军区政委，程子华、刘澜涛、罗瑞卿为副书记兼军区副政委，姚依林为秘书长。罗瑞卿兼军区政治部主任，蔡树藩、潘自力为副主任。

中共晋察冀中央局  
（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 中共中央关于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部署<sup>①</sup>

(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九日)

各中央局：

(一) 国共谈判暂时很难有结果，国民党军队在敌人掩护下业已进入许多大城市及交通要道并有进入北平、天津之可能，伪军几乎全部为国民党掌握，热河及察哈尔两省我必须全部控制，东北全境我亦有控制可能。但红军在十二月初将全部撤离东北（热察两省将更早撤退），我必须迅速作妥善部署，方能保障我党对于东北的控制。

(二) 目前我全党全军的主要任务是：继续打击敌伪，完全控制热察两处，发展东北并争取控制东北，以便依靠东北和热察两省，加强全国各解放区及国民党地区人民的斗争，争取和平民主及国共谈判的有利地位，为此特作下列部署，望坚决执行之。

甲、冀察晋（除冀东外）及晋绥两区以现有力量对付傅作义、马占山向察哈尔张家口之进攻及将来胡宗南由北平向张家口之可能的进攻，坚决打击傅马及其他进攻之顽军，完全保障察哈尔全境、绥远大部、山西北部及河北一部之占领，使之成为以张家口为中心的基本战略根据地之一。

乙、山东主力及大部分干部迅速向冀东及东北出动，第一步由山东调三万兵力到冀东，协助冀热辽军区肃清伪军开辟热河工作，完全控制冀东、锦州、热河，并在将来红军撤退时完全阻止顽军进入东北、热河，另由山东调三万兵力进入东北发展并加装备。

丙、华东新四军（除五师外）调八万兵力到山东和冀东，保

① 本文原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8—1949）（13），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7 年 3 月第 1 版。

障与发展山东根据地及冀热辽地区，浙东我军即向苏南撤退，苏南、皖南主力即撤返江北。

丁、成立冀热辽中央分局并扩大冀热辽军区，以李富春为书记，林彪为司令，罗荣桓到东北工作，将山东局改为华东局，陈毅、饶漱石到山东工作。现在的华中局改为分局，受华东局指挥，其人员另行配备。

戊、晋冀鲁豫军区竭力迟阻并打击顽军北上部队，准备三万兵力在十一月内调到冀东和进入东北。

己、全国战略方针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只要我能控制东北及热察两省，并有全国各解放区及全国人民配合斗争，即能保障中国人民的胜利。

庚、关于各区具体部署另定。

中央

(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 目前的时局与任务<sup>①</sup>

(一九四五年十月二日)

聂荣臻

我离开边区已经两年。在这两年之中，分局、军区及全党全军各级干部在党中央与毛主席正确领导之下，努力奋斗，坚持渡过了抗战的最后困难阶段，直到反攻的胜利，在各方面工作上，都获得了大的成就。

由于日寇的迅速投降，反攻阶段为时很短，但在这短短的时期中，国际国内形势，变化多端，在许多问题上，同志们的看法尚不尽一致。现在我代表中央局说明下列几个问题，首先是关于时局的几个问题。

(一) 苏联参战与日本迅速投降问题：苏联在战胜德国三个月后，即参加对日作战，一方面由于红军的强大，另一方面，日本虽然是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但数年来遭受了严重的损失，已处于不利的形势，加上苏联的拦腰一击，使他无法继续作战，只好迅速投降。但由于日本的迅速投降，致使我们在思想上、组织上的各种准备工作，都发生了措手不及的现象。

(二)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订立，是苏联外交的必然方针。苏联在战胜希特勒后，为了继续打败日本法西斯，与在战后维持远东与世界和平，在中苏外交上，应当有所协定，而国民党政府在中国据有合法地位，因此苏联与他订立友好同盟条约，是正确的。苏联参加对日作战，迅速打败日本法西斯，对中国人民有利，苏联根据条约而使他在出兵区域与撤兵

这是聂荣臻在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干部大会上的报告。

时间上受到限制，其目的在于避免远东重新引起冲突与争取世界和平，对中国人民也是有利的。但我党的政策，则决不能为苏联与中国的外交关系所约束。有些反动分子挑拨离间说，中苏条约的订立，说明苏联只帮助国民党，不帮助共产党。我想苏联红军进入东北，并不是给蒋介石打天下，苏联也没有给蒋介石打天下的义务。苏联《红星报》与《消息报》，曾再三指出中国不应继续成为半封建的落后国家，并对毛主席赴渝谈判，极表关切。有些同志对苏联的要求是过高的，须知远东问题甚为复杂，与巴尔干大不相同。我们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来争取胜利，不能依靠别人，只有我们自己有力量，有正确的方针，才能取得国际的支援，才是正确的道路。

（三）进攻大城市问题：日寇宣布投降后，我们向敌占大城市及交通要道举行全面反攻，这种处置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朱总司令的命令，包括了从军事上进攻与政治上进攻两方面的意义，以争取接受日军投降，夺取大城市。但由于蒋介石、何应钦垄断投降，不许我们参加，以致日军不可能也不愿意向我投降，使我不能进占平、津等大城市，我乃迅速转移兵力，夺取中小城市，壮大自己的力量，这种处置也是对的。国民党反动派依靠其合法地位，垄断我中国人民八年来以无数牺牲代价所换来的抗战果实，我们的愤恨不平，是完全对的，但绝不因之而悲观失望。毛主席曾屡次指出中国革命的长期与曲折，正足以说明这类问题。

（四）国共谈判问题：毛主席到重庆谈判，是目前全党最关心与全世界最注意的问题。为什么毛主席要到重庆去？蒋介石在日寇投降后，曾一而再，再而三的电邀毛主席赴渝，共商团结建国大计。在此最紧张的时期，全中国和全世界都注目于国共两党，是和平？还是内战？蒋介石抓住了这个时机，虽然我在政治上有许多优势，但如果不去，我们在政治上就要处在被动地位。全国和全世界人民都需要和平，如果毛主席不去，就会脱离群众，去了，则我为和平民主团结而去，就可以取得政治上的主动。因此毛主席

席毅然决然而去，以去来争取我党在政治上的主动，去，本身就是斗争形式。蒋介石的手段是拖延时间，谈判了一个月，尚无结果，双方距离尚远，蒋介石在政治上并未对我让步。今后谈判还可能继续拖延下去。但我们一方面不应放弃谈判、主张内战，另一方面决不能以为毛主席去谈判了，便天下太平了。要使谈判有结果（实现和平民主团结），必须依靠我们的斗争和发展，有力的击破敌伪顽合流对我之阴谋，只有我们坚决的斗争，才能争取谈判的有利条件。

（五）美军登陆问题：美军已于九月三十日在大沽口登陆，其目的在帮助掩护运输国民党军队进到平、津，以及将来进入东北。这个事件，说明蒋介石依靠外援，企图依靠美国来做斯科比<sup>①</sup>，又说明平、津在我包围之下，有为我夺取可能，美国不惜揭〔暴〕露其帝国主义面目，露骨的支持蒋介石，对抗我们。我们应当充分认识东方斯科比的危险，认识蒋介石在美国支援下，更进一步的积极准备内战。我们的方针，是在政治上批评美国这种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在军事上避免与美军发生冲突，以求避免美蒋的斯科比阴谋，但如美军向我进攻，则应迅速将经过情形向全世界宣布。我们相信美国人民是要求和平的，他们不会赞成斯科比，他们会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与直接参加中国的内战。对于这一事件，新华社已有评论，应根据此作宣传。

以上五个问题，一方面说明全中国、全世界人民和我党都主张和平、民主、团结，另一方面则是日寇和全世界的反动派法西斯分子还在继续挑拨反和平反民主的战争。特别在中国，目前存在着严重的内战危机，中国国民党反动派，正在积极准备反民主反和平的内战，要夺走中国人民抗战八年中用无数流血牺牲代价

<sup>①</sup> 斯科比，是英国派驻希腊的英军司令。一九四四年十月，德国侵略军在希腊败退，斯科比率领英军，带着在伦敦的希腊流亡政府进入希腊，并于同年十二月，指挥英军协助希腊反动政府，向长期英勇抵抗德军的希腊人民解放军进攻，屠杀希腊爱国人民。

所取得的胜利果实，使中国继续成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法西斯统治下的半封建的落后的中国。

在目前时局中，我们应当怎样办？

抗战阶段已经过去，我们的任务，是为了和平民主团结而斗争。反和平反民主的势力正在积极的向我进攻，我们必须为和平民主而战斗；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要夺回中国人民在政治上经济上的既得利益，我们必须为巩固我们的胜利而战斗。因此一切盲目的乐观心理，以为抗战已经胜利，我们已经拥有广大的解放区，天下从此便可太平的心理，是不对的。我们目前正处在历史的最紧要的关头，抗日战争结束了，为和平民主团结的斗争正在开始。我们必须坚决的进入斗争中去，以不懈怠的继续斗争，来巩固与扩大我们的胜利。必须向全党全军及每一个要求和平民主团结的人民，特别是工人、农民，说明这个问题。

我们原有的根据地，是我们的中心堡垒，必须固守之。但我们不仅要固守原有的解放区，还要继续扩大新解放区。我们要发展与巩固察哈尔（以张家口为中心）热河两省，控制冀热辽全境，争取我党在东北的优势，争取绥远之大部。这就是说，我们在华北要大大的向北发展，形成更大的民主的解放区。依靠解放区的力量，配合大后方的民主运动，来实现中国的和平与民主。抗战时期与内战时期，我们长期处在敌人的包围中，现在我如能实现这一战略方针，我们就能脱出全线包围，使我处在更加有利的地位。

要实现这个方针，必须积极的行动，壮大自己的力量，采取攻势。反动派是会向我们进攻的，当我兵力尚未集结时，张家口的形势不是十分危险么？傅作义、马占山不是迫近了柴沟堡么？抗战中他们远遁于五原、河套，现在他们又跑来“受降”。虽然他们的爪牙已经被我斩断，但他们是决不会忘情于张家口的。我们收复了丰镇、集宁，他们又勾结日寇抢回去，他们发展土匪，到处骚扰，造成绥远民不聊生的现状。因此我们必须坚决打击挑起内

战的祸首，因为他们先进攻我们，我们就必须打他们。毛主席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因为他们犯我，我就必须犯他。同时我们还要准备反动派在斯科比掩护下向我解放区进攻。我们要号召全边区的主力军、地方军、民兵，仍在生产与战斗结合下，为和平民主而战斗。

现在谈几个具体问题：

（一）军事上的转变问题。在抗日战争中，我之战略方针，是基本上的游击战，但不放弃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今天我们在对付顽伪进攻的自卫战争中，主力军必须进行运动战，配合以地方群众性的游击战。但大家必须了解，进攻我们的敌人，有强弱之分，有嫡系非嫡系之分，我们已经八年没有同他们见过面，因此对之必须有新的认识，不要固守于过去的经验。大兵团的作战必须要求在军事上统一与集中，但同时又由于根据地交通不便，又要保持各个独立作战的机能。我们要积极的集中主力，但又要使根据地拥有强大的地方武装与强大的民兵更加提高一步，使顽伪不能进入我根据地一步。如果他们敢来侵扰我们，他们就会遭受我地方军与民兵的爆炸与打击，如同过去对付日本鬼子一样。在统一与集中的原则下，主力军必须编整，必须正规化，脱离游击队性质，进到我现有条件下的正规性，建立各种制度，严格军风纪。

在军民关系与官兵关系问题上，过去曾长期的提出与进行教育，进行过拥政爱民运动，但如真要从思想上来解决问题，是不容易的。在我根据地中，老百姓成了主人翁，犯纪律的机会比较少些，但是一到新解放区，许多同志就把自己看成统治者，不论在城市与乡村，都障碍了我们工作的开展。军队的干部，必须了解党的主张与政策，因为党的政策、政府的法令，首先就要由军队的行动来表现。军队中目前打骂现象与逃亡现象还很严重，固然与新战士增多、任务繁忙有关，但首先必须解决官兵关系问题，加强政治工作。只有这样，才能大大的加强我军的战斗力。在这

些问题上，今后要规定许多具体的要求。

（二）由乡村到城市的转变及其联系问题。我们由乡村来到了城市，这是一个转变。以张家口来说，从工业上来看，已经不是个小城市了，我们入城后的工作，一般的说，还是做得好的，当然并不是一点缺点都没有。在农村里住惯了，对于城市中的一切，没有经验，不大习惯，需要一个时期才能转变。由于我们没有经验，又缺乏思想准备与组织准备，因而使工作受到了许多损失，我应很好的积累此种经验，不要把农村中的一套照旧搬运过来。在农村中我们依靠农民，在城市中我们就要依靠工人，如果解决了工人问题，城市便会成为我们的根据地。

但在另一方面，象张家口这样的城市，我们只有一个。我们还没有更大的城市。要巩固我们的城市，还必须依靠农村的帮助，如果城市与农村脱离，则城市是孤立的。我们要把城市工作做好，使城市有利于乡村（例如减低工业品价格，供给农业工具，解决农民原料销售问题等），但决不能放松乡村的工作。在乡村中，我们有几十万党员，几千万农民，占我们党员与人民的绝大多数，我们决不可忘记他们，必须加强乡村的工作。到城市里来的干部，在应当回到乡村去的时候，就要回去，不要忘记乡村是我们的母亲，我们是从那里生长起来的，目前仍然是我们主要的根据地和主要的依靠。目前在乡村中还有许多严重问题，如粮价骤跌，谷贱伤农，反攻以来干线上勤务繁多（特别在新解放区），有些同志在乡村中的“抓一把”现象，都需要立即解决。今年各地应积极组织群众从事秋冬生产，并准备明年的大生产运动，不仅要运用我们的固有经验，而且要切实的从组织生产中创造新的经验。我们要长期的依靠根据地中的几千万农民，这是我们战胜一切敌人与一切困难的保证。

（三）发动群众问题。反攻以来，我们解放区扩大了，必须放手发动群众，领导群众来进行改善工人农民生活的斗争与反对汉奸特务的斗争。在改善生活的斗争上，我们过去已经有了一套经

验，在反汉奸特务的斗争上，必须号召人民起来控诉他们的罪行，领导群众复仇的怒潮，严惩群众所痛恨的汉奸特务，使群众在政治上能翻过身来，把汉奸特务的社会地位彻底打下去，在经济上能清算汉奸特务对他们的剥削掠夺，得到现实的经济利益。我们实行宽大政策，主要是表现在少杀人，而不是抑制群众复仇的怒火，模糊敌我的界限。在斗争中要帮助群众，提高其政治觉悟，而不是去包办、命令、恩赐。我们的党是有枪杆有政权的党，如果我们去包办代替群众的斗争，实际上必然会障碍群众的发动。工人方面，在私人工厂中，应当发动对资本家要求改善生活的斗争，在公营工厂中，政府与党则应处处帮助工人，解决他们的困难问题，使他们了解党与政府是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困难的。分散给部队机关经营的工业，必须很好的去经营。凡是赢利的公营工厂，应当以赢利之一部用作改善工人生活，坚决反对同敌人一样的打骂工人，侮辱工人，以及对工人的残酷的殖民地和封建的剥削。我们对工人采取什么态度，是党员的阶级觉悟的最好的测验。

（四）财政问题。解放区扩大了，部队增多了，开支也增大了。老百姓渴望着抗战胜利能使他们减轻负担，但农民的负担并未减轻。今后财政上必须更加统一，进一步走上轨道，要厉行节约，一方面要照顾战士的生活（现在战士生活还很坏），另一方面必须克服目前普遍存在的浪费现象。不要以为缴获的物品都是从敌人那里得来的，我们便可以随便浪费它，要认识我们如果能节省一分，就可以减轻人民的一分负担。

目前我们正处在历史的最紧要关头，我党我军虽然已经经过了长期的考验，但历史还要继续考验我们。我们有了成绩，得到了不少胜利，但是决不应当骄傲。我们有许多有利的条件，如我党我军及解放区之扩大，斗争经验之丰富等，但困难与艰苦奋斗还继续存在。毛主席曾说过，革命本来就是一件麻烦的事情，我们不应当怕麻烦。中国是四万万五千万人的大国，中国革命是长期的复杂的，我们不要幻想，以为华北一下子便会完全为我们所

有，我们应当不怕艰苦，不怕困难，发扬长期终身为革命事业服务的精神，便不会产生侥幸懈怠的心理。

我们必须团结，只有团结才能胜利。尤其在困难的时期，只要我们团结，任何困难都能克服。只看自己、不看别人，只看局部、不照顾全局的本位主义，各级领导机关与各部门均应检讨纠正。在目前困难时局中，只有全党全军团结一致，统一集中，在党中央与毛泽东同志的政治方针与战略方针下，大家为着全局而奋斗，则步调可以一致，任务也就更易于完成。

(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 中共晋察冀中央局 关于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的指示

（一九四五年十月十日）

反攻以来，我军收复了广大的新解放区，包括过去长期在敌伪统治下的乡村与中小城市。在这些新解放区的首要任务，就是放手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使广大基本群众从敌寇汉奸及统治阶级的压迫奴役下翻过身来，建立革命的新秩序，使新解放区迅速变为我之坚强根据地。目前我们正处在时局的最紧要关头，敌寇汉奸与国民党反动派互相勾结，向我解放区进攻，以求夺取我们与广大人民在八年抗战中以无数流血牺牲的代价所换取的抗战果实。我们必须为争取和平民主团结而奋斗，为保卫人民的既得利益而奋斗。我们收复的广大新解放区，临近铁道与大城市，敌伪顽之进攻与我之自卫战争，可能以这些地区为主要战场，而这里敌伪有长期的统治历史，地主阶级有雄厚的社会基础，基本群众的政治觉悟还没有高度发扬，我们还缺乏坚强的群众依靠，因此放手发动群众，更为这些地区刻不容缓之急务，各地必须用最大力量，进行这一工作，求得于今年秋冬获得一定成绩。

发动新解放区的群众，主要是领导群众的反汉奸反特务的斗争和群众的要求改善生活的斗争，以及二者的配合与联系。新解放区的广大群众，对汉奸、特务有极深刻的仇恨，向他们控诉清算复仇，往往是新解放区群众首先的要求。我党必须支持与领导群众这一复仇运动。在政治上，应尖锐的反对汉奸、特务，把他们原有的政治地位与社会地位彻底打下去，代之以群众的民主政权。有些地区，使用敌伪人员担任与群众相接近的工作，甚至昇以要职；有些地区，不在群众中宣传反对汉奸、特务，模糊敌我

的界限，甚至抑制群众自发的反汉奸、特务运动，这对于发动群众都是有害的。在经济上，要领导群众对汉奸、特务的清算斗争，没收罪大恶极为群众所痛恨的汉奸的财产，有计划的分配给贫苦的人民，帮助基本群众追回汉奸、特务掠夺他们的财产，使群众得到现实的经济利益。我们执行宽大政策，主要是表现在少杀人，而不是抑制群众的复仇怒火，模糊敌我的界限。反汉奸、特务的主要对象，是罪大恶极的大汉奸与群众所深切痛恨的伪警特务，至于一般与群众接触较少的伪机关公务人员，只要没有重大的罪恶行为，不应使反汉奸、特务斗争株连过广，引起他们与我之对立。在领导群众改善生活的斗争上，在农村主要是领导减租减息运动，在城市主要是领导工人增资与改善待遇的斗争，并解决城市贫民与手工业工人的迫切要求（如洋车夫减少车租，工人及城市贫民减少房租等）。在我新收复的城市，由于工业一时不能全部恢复，我应主动的解决工人的失业问题，一方面进行救济与组织他们参加其他生产，一方面发动他们自愿的参加我军，其不愿参军又无法安插者，则应有计划的给以路费，遣送回到农村去，各县政权对于城市回去工人，必须妥为安置，帮助他们进行生产。各地公营工厂工人，我们必须改善他们的生活，启发其劳动热忱与生产积极性。

广大群众的反汉奸、特务斗争与改善生活的斗争，二者是互相联系的，各地应根据具体情况，决定以何者为主导，只要顺利的解决了一方面，便可以发动群众的斗争积极性，顺利的解决另一方面。但在一般情况下，在敌伪长期统治的地区，群众反汉奸、特务的复仇怒潮，往往较之减租增资的要求，更为迫切。在斗争中，必须反对恩赐观点，高度发扬群众的斗争积极性，破除他们的疑虑，耐心的教育启发，当他们的自觉性尚未高度发扬时，不应操之过切，包办强制，以致发生“欲速则不达”之。在斗争中，必须放手发展与建立群众团体（首先是工会、农会），大量发展党。

目前在新解放区，由于军运及干部调动之繁忙，群众的抗战

勤务很重（有的交通大道老乡开始逃跑，焚毁车辆），各地必须迅速整理，严格限制抗勤，并从思想上纠正干部与军队的官僚主义、军阀主义思想，纠正干部在动员工作中严重的强迫命令作风，传达二分区尖山暴动与十一分区里外十三村暴动的教训，号召全体干部深自警惕。

我原有之老解放区，是八年来我们所依凭以坚持抗战的根据地。自反攻以来，由于干部的大批调出及反攻任务的繁忙，对这些地区的领导一般是削弱了，各区党委应即加强对这些地区的领导，指定专人负责研究这些地区的工作，这里有久经锻炼的广大的党和与我们长期共患难的人民，至今仍是我们的主要依靠，我们决不能脱离他们。对于今年秋冬如何组织群众生产，准备明年的大生产运动，救济灾荒，减轻群众负担等工作，各地应即根据八月分局关于秋冬工作指示，规定具体办法，切实执行，并须利用我在城市中的各种关系，购买各种工业、农业机器，利用各地自然条件，大量成立小型工业作坊，并逐渐改进目前农村小手工业的生产方式。目前各地粮价骤跌，谷贱伤农，各地应研究具体办法，加以补救。

（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 晋察冀边区各界抗日 救国联合会关于取消抗联会 及恢复各团体独立领导系统的决定

(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一日)

一、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工、农、妇、青、文等各团体常委扩大会议根据当时根据地群运的发展、对敌斗争形势与精兵简政政策的需要决定建立抗联会，实行了群运的统一领导。几年来边区群运在抗联会领导下，坚持了对敌斗争，进一步发动了群众，开展了大生产运动，扩大了解放区，成绩是伟大的。事实证明当时建立抗联会是符合于几年来斗争形势的需要，是正确的。但同时，由于抗联会这一组织形式本身的缺点和领导上的缺点，也产生了抗联建立以来在群运的领导上对工农运动阶级性的某些模糊与对妇女、青年、文化运动特殊领导的照顾不够等缺陷。

二、今天抗战已经胜利，解放区迅速的扩大，群运的蓬勃发展，工人、农民、青年、妇女等运动的特殊性需要大大发挥，以使群运广泛的、全面的开展起来，为此决定取消自边区一直到村的各级抗联会，恢复自边区一直到村的工、农、妇、青、文等各团体的独立领导系统（边抗八月十六日关于恢复各团体领导系统及取消村抗联的决定，已不适合今天形势发展的需要了）。并提议各团体名称取消“抗日救国”四字，称之为“工会”、“农民会”、“妇女联合会”、“青年联合会”、“文化界联合会”等。

三、由于解放区的迅速扩大，发动群众任务的十分紧张，干部很感缺乏，因之在执行这一决定时应在不过分影响工作的原则下，采取积极行动配备干部。各级抗联接此决定后应迅速配备同级与下级各团体的干部，并帮助树立各团体工作，各团体有了负

责干部时才可进行交代取消抗联，防止发生领导上的空隙，使目前发动群众的领导上遭受不应有的损失。

四、抗联取消，各团体独立领导树立之后，应很好接受过去团体独立领导与统一领导的经验，在共同的任務上应很好注意到各团体领导上工作上的密切配合，如老解放区的大生产、经济、文化建设，新解放区的发动群众等，为此各团体各级可建立联席会。同时各级各团体机关生产的经营与专区以下各团体伙食等可以在民主的协商原则下统一起来。专区以下秘书处，得结合为一个。

五、边区级各团体组织及负责人，由各团体分别通知。

晋察冀边区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

(原件存中央档案馆)